

文章编号:1673-047X(2010)-05-0030-02

古代旅游也是文化遗产

——从明代苏州游冶之风说起

郑丽虹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旅游是古代十分盛行的“游山玩水”,早在唐宋已经很发达。古代游冶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既与手工技艺、商业贸易发生十分紧密的关系,又形成了具有时间、空间的文化场所,所以,它不但是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明代以来,由于地域经济的高度发展,苏州集中了许多士大夫和富商,在他们的引导下,当地的游冶之风极盛。这种游冶活动是多层面的,包括宦游、雅集游、园林游、漫游、民俗游等。这就使与旅游相关的手工艺得到有效的发展,如交通工具、游具的生产等。而著名旅游地点、庙会集会场所及其周边街区是文化场所,在一定的时间里产生了有强吸引力的文化空间,形成充满商机的集市,从而繁荣了地方经济。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古代旅游;苏州游冶;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旅游并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现象,古代宦宦、文士、富商乃至平民都曾乐此不疲。只是当时并不称为旅游,古汉语中与之相对的词是“游”、“游冶”、“冶游”。唐代李白、欧阳修都曾在诗词中提到“游冶郎”、“游冶处”。“冶游”就是“野游”,宋代《乐府诗集》曾有“冶游步春露”的诗句。但后来使用“游冶”、“冶游”时多少有一些贬义,原因是这种游乐常常携妓同行。宋代朱熹则直呼旅游为“游山玩水”,明代也有此说,古籍中常见的“乐山水”、“爱山水”、“游山水”、“好山水”都与游山玩水有关。而明代苏州由于经济高度发达,宦宦、文人、富商生活富足悠闲,所以游冶之风日盛一日。游冶活动的刺激,使与之相应的各类用品生产蒸蒸日上。这不但在文人的笔记中有大段描述,而且在明清诗词、绘画中也屡见不鲜。这种以游冶带动其他行业的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历史经验,它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遗产。当然,今天的旅游业不可等同于古代的游冶、冶游或游山玩水,但经过筛选仍有可取之处。

1 苏州自古旅游资源就十分丰富,宋代以来更是文人雅士、客商宦宦流连忘返的处所,无论是城中的私家园林还是郊外的太湖山水,都吸引着本地和外地的游山玩水者纷至沓来,形成了可与杭州西湖相媲美的游览胜地。但为什么明代中晚期至清代盛期苏州游冶活动会达到高潮?这一切都离不开当时苏州独特的经济背景和人文背景。

明代之前,苏州一直是重要的地区行政中心,但明初曾因朱元璋对张士诚的报复而殃及苏州,使得当地经济文化倒退。据苏州府长洲县人王琦(1433—1499)的描述,苏州城直到正统、天顺年间仍不是十分繁荣,仅是“稍稍复其旧”。到了明代中叶,才得益于特殊的区域地理环境、优越的商业地理位置、工商皆本思想的催化以及明朝特殊的政策环境,苏州作为全国首要工商城市的地位方最后确立。至成化年间,苏州恢复了繁华,“迥若异境”,而到弘治朝,已是“愈益繁盛”。唐寅《阊门即事》咏道:“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又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贾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

到明代晚期,苏州不仅为“江南首都”,而且“财赋奥区,商贩之所走集,货财之所辐辏,游手游食之辈,异言异服之徒,无不托足而潜处焉。名为府,其实一大都会也”。同时,这时的苏州还是“全国的远距离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各地商人云集,“其城内及四门之外皆市廛闾閭。商贾辐辏,货物腾涌,龙断之人居多”。进入明代晚期,苏州的优势地位还从贸易领域扩展到制造业和金融行业。

苏州的经济繁荣首先造就了一个富裕的阶层,其中不但有广占田产的本土地主,还有因经商致富的“洞庭商人”和徽州客商,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既饱读经书又喜爱游冶的风流文人,他们中有出仕为官者,也有“市隐”于园林者,还有诗书画全才的雅士。正是这两类人掀起了苏州的游冶之风,而文人则是“导淫导奢”又“导游”的急先锋。

苏州文人在明初曾遭到朝廷的境遇甚至迫害,中期以后有所改善,但这种境遇在许多文人心中留下了阴影,于是产生了超脱尘世的思想,而 they 又舍不得丢弃世间的种种享受,结果或是筑园林邀文士雅集于假山楼阁之间,或是结伴外出游山玩水。明代画家沈周在笔记中说:“今之仕宦罢归者,或陶情于声伎,或肆意于山水,或学仙谭禅,或求田问舍,总之,为排遣不平,然不若读书训子之为得也。”台湾学者吴智和曾把苏州文人集团的文化生活归纳为四类:居家园林、山水揽胜、器物玩赏、艺文流连。四者既可以独立存在,也可汇而为一,因人而异,但讲求闲适、真趣、清赏的生活态度则是吴中文人共同追求的精神消费方式。

2 文人的“导游”使游冶成为文雅之举,富有的商人为附庸风雅追风而上,市民也深受感染,苏州的游冶就此愈演愈烈。曾任

收稿日期:2010-05-25

作者简介:郑丽虹(1969-),女,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艺术设计史。

吴县知县的袁宏道在《荷花荡》一文中说到苏州的游冶:“其男女之杂,灿烂之景,不可名状,大约露帏则千花竞笑,举袂则乱云出峡,挥扇则星流月映,闻歌则雷辊涛趋。苏人游冶之盛,至是日极矣。”

明代苏州游冶之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游冶活动也是多层面的,包括宦游、雅集游、园林游、漫游、民俗游等。

宦游就是外出做官时的游历,在明代早期一般冶游不太兴盛时,宦游比较多见。这些为官的文人常常写有笔记,记录了宦游的历程。如吴郡(今苏州)人顾芥嘉靖年间在海南儋州做官,曾官致南安府知府,并将所见所闻写成《海槎余录》,其中记录了当时海南的许多风土人情。他说:“儋耳孤悬海岛,非宦游者不能涉,涉必有鲸波之险,瘴厉之毒。”文中记录了当地黎族的风俗:“黎俗男女周岁即文其身,自云:‘不然则上世祖宗不认其为子孙也。’身穿花厚布衣,露腿赤足,头戴漆帽,傍簪尺许雉尾二茎披肩领间,可耻也。男子家富者,两耳复簪盂口大银圈十数为富侈。”提到的当地土产则有花梨木、鸡翅木、土苏木、桃榔木、佛桑花、菠萝蜜、橄榄、茉莉花、杨桃、荔枝、芭蕉、椰子、鹦鹉杯、玳瑁等。

雅集游多是文人相聚,或以诗文书画互酬,或一起品鉴古画文物,或堂会演唱昆腔传奇,而一遇春秋佳日,必然呼朋唤侣,游山涉水,吃喝玩乐。苏州人的“雅集”是当时上流社会最流行的一种活动,这在吴门画派的绘画中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反映。他们往往取私家园林、富人豪宅或太湖为聚集之所,既观赏自然景观,又抒发满腔雅兴。明代苏州人张应文记录了隆庆四年(1570年)三月吴中四大姓做“清玩会”共赏文物珠宝的盛况:“余往观焉,一出文王方鼎、颜真卿裴将军诗;一出秦蟠螭小玺、顾恺之女史箴、祖母绿一枚、淳化阁帖;一出王逸少此事帖、龙角簪一枝、宦窻葱管脚鼎;一出郭忠恕明皇避暑宫殿图、白玉、古琴、李廷珪墨二饼。自幸曰:不意一日见此奇特,所见尤异者古铜则夏铜……”

漫游是典型的游山玩水。苏州在明清时期已是与杭州齐名的游览胜地,不仅苏州人到处游山玩水,外地人也热衷于到苏州游玩,明代中晚期大量出现的游记可以为证。如苏州人写的游记有:文徵明《洞庭东山诗叙》、《游玉女谭山居记》;王世贞《慧山东西二王园记》、《游洞庭两山记》,吴宽《光福山游记》、《游兴福寺记》、《游阳山大石崖云泉庵记》、《游东湖记》;王鏊《洞庭三记》、《游五湖记》、《七十二峰记》、《登莫厘峰记》、《静观楼记》;袁中郎《袁中郎随笔》、《袁中郎游记》;顾芥《海槎余录》等,涉及的游历地既有苏州本地,也有外地,最远的是海南。外地人写苏州的游记则有郭郡汪道昆《游洞庭山记》,山阴王思任《游太湖洞庭记》,京山李维贞《太湖西洞庭游记》,会稽陶望龄《游洞庭山记》,山阴张岱《陶庵梦忆》等。比较特殊的是苏州昆山人费信,他曾作为翻译官随郑和的船队下西洋,写有《星槎胜览》记录自己的游历。其他文论中涉及苏州游冶的文字更是多不胜数。

所谓民俗游,是频繁的民间集会、庙会、节日活动形成的大型群体活动。如果说,上面种种游冶多是上层社会所为,那么,民俗游几乎是全民参与的游冶。明人黄省曾《吴风录》记载:“自吴王阖闾造九曲路以游姑胥之台,台上立春宵宫,为长夜之饮;作天池泛青龙舟,舟中盛致妓乐,日与西施为嬉。白居易治吴,则与容满婢妾十妓游宿湖岛。至今吴中士夫画船游泛,携妓登山,而虎丘则以太守胡纘宗创造台阁数重增益胜眺。自是四时游客无寥寂之日,寺如喧市,妓女如云;而他所则春初西山踏青,夏则泛观荷荡,秋则桂岭九月登高,鼓吹沸川以往。”这类活动每年都很频繁,无论是祀神赛会、庙会,还是节令、时俗,都会吸引大量市民接踵而至,刺激了游冶的兴盛。如与宗教信仰相联系的民间庙会成为新的节庆,参加者遍及各阶层。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蛮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僮童走空之辈无不鳞集,自生公台、千石鹤洞、剑池、申文定祠下至试剑石,一二山门皆铺毡席,地坐等。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天限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小擂十番铙钹,渔阳掺……动地翻天……”苏州还盛行着以歌舞、杂技、戏剧等为主要内容的祀神赛会。王穉登记载的“五方贤圣会”“会境”(即赛会地点)就有五龙堂、东仓、娄门、葑门、专诸巷、康王庙、丁香巷、北营、胥门、虎丘寺等17处,如此规模在全国各地都是少见的。与节令时俗相关的活动也很多,特别是六月的荷花节最为热闹。其他还有一月元宵节、二月文昌会、三月迎蚕神、四月浴佛节、五月端午节……难以胜数。

3 古代游冶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既与手工技艺、商业贸易发生十分紧密的关系,又形成了具有时间、空间的文化场所,所以,它不但是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明代苏州游冶的兴盛固然有经济繁荣为背景、文人雅集出游为先导,但也应该看到,游冶兴盛与地方经济是互为推动的良性循环,尤其使手工技艺得到有效的发展,这是它留给我们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

当时的江南水乡以舟船为重要交通工具,无论水陆游冶活动都离不开舟船,苏州甚至大量出现“画舫”、“花船”,成为明清时期的独特风景。明人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中还记载了许多名称不同的“舫”,如“小舫”、“雪舫”、“湖舫”、“酒舫”、“画舫”等。当时乘坐画舫自苏州城至虎丘山是普通市民最流行也是最奢华的旅游方式。《聊斋志异》也有这样的描写:“五月五日,吴越有斗龙舟之戏;剡木为龙,绘鳞甲,饰以金壁;上为雕甍朱槛,帆旌皆以锦绣;舟末为龙尾,高丈余;以布索引木板下垂,有童坐板上,颠倒滚跌,作诸巧剧。”画舫的流行不但刺激了造船业,也养活了船家。当时苏州有数百人以游船为生。“万历时,吴苏大荒,当事者以岁俭禁游船。富家儿率治饌僧舍为乐,而游船数百人皆失业流徙。”游冶的交通工具不仅有船,还有肩舆、轿子和舟楫。这同样刺激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游具的发展紧随交通工具之后。当时人出游前必先“治装”,就是准备必需携带的用品。魏向东曾将明代游具分为两类,一类是满足基本需求的游具,包括饮食、住宿、交通三方面;另一类是满足精神需求的游具,如娱乐器具等。为了旅途中的享受,富人往往带有厨师和“行厨”(小型厨房)。明人高濂《遵生八笺》记录了他设计的两种便携式饮食具。一件是提盒,高一尺八寸,长一尺二寸,深一尺,可装菜肴、果蔬、酒杯,供六人享用;另一件是提炉,高一尺八寸,长一尺二寸,阔一尺,内有水火炉,可供茶、煮粥、温酒。明代苏州市面上有“打造锡器”、“打造铜器”、“成造各类漆器”的店铺和作坊,可见,出游用具必然可以定制,也会有品种多样的游具适应市场的需求。

(下转第33页)

但是从她对乡村生活简练而又诙谐的语言描绘和形象来看,明显地反映出她对过分简单阐释的抗拒。她的画既有山羊、牛和野玫瑰,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工业小区”、(高压线)铁塔、低于小桶的人、运河(北道)、铁塔拱门、小飞机、电话线、铁桥等等,既不是城市,也不是理想化的乡村。

她与许多具有同样感觉的人一样有着同样的想法:乡村及其生活有可能更容易受到威胁。虽然她的艺术不是完全远离政治,但是却使人完全感到她已经在某个时间发展了它。当自然主义者、经济学家以及绿色和平主义者呼吁人们不要破坏大自然的时候,她已经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田园的视野。当她和她的丈夫住在离一个河谷不远的农场时,看起来就像一个当地的传说,即她是一个“新郊区牧师的妻子”。但是她的艺术同情心和分离的特性相混合,却捕捉到了深深根植于没有变化的乡村人生活方式中的一些东西。

纽卡姆有时强调她是“未教化的”,甚至故意地宣称她并不真正地知道怎样画画。当然,她的作品显示出这并不是事实。她的画很幸运地脱离了学院派的样式。她的作品,有着基于实验的感觉,不是来自于技能的缺失,更多地则来自于对其敏感地不信任。所以,她的画是直接的、不复杂的,甚至有些时候,没有自我意识的魅力,而给人一种触觉笨拙的感觉。她一点也不慌乱地安排她的主题——经常是一闪而过或奇怪的事件,她画得很快,最后的结果看起来很幼稚,似乎是她画的越本能,她的主题表达得就越容易引起共鸣。纽卡姆有着异常的微妙的处理能力,通过其温柔的刷子,她在法国南部海岸发现的一种野花就被表现了出来,她并没有用过多的水彩,在她看来,如果那样做了,就应该做一幅水彩画。然而,当她画这些画的时候思路是清晰的,开着红花的野豌豆,一定要使它成为水彩的状态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上,没有一点线状模糊的暗示。她清楚地感到,艺术应该与自然一样是不被强迫的。她的艺术来自于试图尽可能地不要先入为主、有所偏见,这当然包括技术。

她经常提醒自己艺术需要真正的独创性,不是新奇(新鲜)。“在我看来,快乐在于去发现而不是被告知事实。”作为一个科学老师,她不喜欢重复教室中的技术,这样的二手思考不适于艺术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她不关注其他艺术。她清楚地意识到与民间艺术的亲属关系,如作品《一个农场主和他得奖的小母牛》。她对于农场动物们的一些阐释来自于未被假定的、经常是无名的乡村绘画。她将这些民间艺术形象(如特别的牛、胜利得奖的猪、重要意义的羊)变成她自己的艺术,用她自己特有的幽默。然而,她的第一位模特,并不是这些老农业文明的画,而是一大群她自己农场的动物,这些动物都是她最熟知而又研究过的。她还习惯画在市场中被展示或在牧场里吃草的动物,这些直接来自于她的记忆,最后转换成了她个人的绘画。

总之,在纽卡姆看来,人类并不是压倒性的多数,而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已。她的艺术属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即当我们的类中心主义,更不用说地球为宇宙中心的观念已经被彻底改变了的时期,我们与环境的重要关系正在遇到困难。也许,我们的艺术太过倾力于个人的野心和伟大:人类是造物主,艺术家的伟大如同造物主。也许我们比我们想象的要小。纽卡姆对于她自己的作品如此道:“这些并不是伟大的作品,我仅仅是设法去表达一些有关和平、平静和我们周围的世界。”

(上接第31页)

著名旅游地点、庙会集会场所及其周边街区是文化场所,在一定的时间里会产生有很强吸引力的文化空间,也会形成充满商机的集市,从而繁荣了地方经济。这是古代游冶留给我们的另一种文化遗产。

著名旅游地点、庙会集会场所及其周边也是商家集中、商品丰富的地段,往往产销两旺。如虎丘山曾是明中期以前文人燕集的理想之地,现在变成市俗阶层游玩享乐的旅游场所。随着商业和旅游业的发展,从苏州阊门至虎丘山脚的河渠两岸,云集了大批手工艺作坊和商业店铺,它们制作了大量的版画、山水名胜图、玩具(包括玩偶)、实用刺绣、灯彩等。版刻业也及时刻印图文并茂的旅游书如《新镌海内奇观》、山水画册等。

回顾明代苏州的游冶,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独特的人文环境,那就是因富足而旅游、因悠闲而旅游、因亲近自然而旅游,文人在游冶中陶冶性情、在游冶中亲近造化、在游冶中化解心中的块垒。这是古代游冶留给我们的第三种文化遗产。

今天的旅游业是近三十年逐渐发展起来的,并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日益壮大。旅游是一种有效的“释放器”,在旅游中陶冶性情、在旅游中亲近造化、在旅游中化解心中的块垒,显然有利于建立和谐社会。当然,古代文人的种种弊病我们不能留恋。

参考文献

- [1] 范金民,夏维中.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2] 朱大可.16至18世纪中国远距离贸易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6).
- [3] [清]顾公燮.丹午笔记[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 [4] 魏向东.晚明玩具及其特征[M].东吴文化遗产(第一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7.